《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是一篇回复文章，就作者的好友，经济学家兼红学爱好者，持“自传说”的赵冈的反对意见撰文。笔者未读过赵冈的驳斥全文，但就作者所引的段落来看，确实既有误会，文字上的处理似乎也过于激烈了些。作者的回复还是证据扎实，就那些赵冈误解作者原意，或陷入“稻草人谬误”的地方，不必多谈。倒是作者就“两个世界”的补充，值得再提。作者认为，虽然后三十回不见踪影，但《红楼梦》结局的“抄家”应当确有其事，因为理想世界的重要现实根据便是“天恩”，“抄家”斩断了这一现实根据，在文学的逻辑上自然而合理。作者也根据现有的“十二金钗”目录，分析了“情榜”名次的理由，贾宝玉是绝对的中心人物。最后，作者“眼前无路想回头”强调了其观点：“传记说”的红学已经走完了历史行程，前面似乎已经看不见路了。

《敦敏、敦成与曹雪芹的文字因缘》通过条举《红楼梦》本文及脂批与敦敏、敦成的诗文，发覆其中的互相印证、关联的地方，指出曹雪芹与二敦兄弟交游颇深之事。并且，二敦兄弟可能参与了脂批的书写。由于今日我们关于曹雪芹的生平信息都来自于二敦兄弟，本文考证的内容当对《红楼梦》的背景有重要的帮助。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前半部分是就潘重规《红楼梦新解》所提出的，曹雪芹非《红楼梦》作者的商榷意见。作者认为，现有的材料不足以否认曹雪芹的作者身份，而视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在逻辑上最理得通，因此姑且只能认为如此。后半部分是就曹雪芹“汉族认同感”的讨论，虽然曹家属于正白旗，但曹家的没落，即使不至于使曹雪芹达到“反清复明”的激烈程度，但对清廷加以讥讽则是可能的。

《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是就上文后半部分的补充说明，作者指出，曹雪芹的朋友中，确有“叛满归汉”的例子，《红楼梦》中也不乏有关“汉族认同”的可疑文字，如“大明角灯”和“耶律雄奴”。作者不认为《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但认为曹雪芹确在穷困潦倒之余逐渐发展了一种“汉族认同感”，并在小说中留下了讥讽满清的痕迹。

《“懋斋诗钞”中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两首诗考辨》是就曹雪芹卒年问题中被视为关键证据的两首诗的内容考证，作者并无意支持俞平伯或周汝昌一派的观点，但确实发现，这两首诗远不足以判断曹雪芹的卒年问题，两首诗间并不存在那种首尾相应的关系。对于这一漏洞的发现，作者不禁感慨，他一向信任的红学考证家，竟然因为求证之心过于热切而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其实也可以理解，无论持怎样的立场，只要不时时小心，严谨治学，都有可能犯错误，毕竟疏漏不是哪一家的专利。作者对考证派红学家的这一错误的比喻大为幽默，“屈打成招”、“大变魔术”之语令人捧腹不已。这倒也是正面证明了，《红楼梦》的相关传世资料实在是少的可伶，完全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完整而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来，只能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了。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考》又是针对赵冈错误的指正，作者旨在说明，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并不在南京而远在北京西郊。作者进一步认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固然有着现实园林的影子，但绝不是以18世纪中国的任何一个园林为直接蓝本的。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探讨了《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反传统思想，指出影响曹雪芹反传统思想最深的是阮籍和《庄子》。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是属于魏晋反礼法的一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是“情”与“礼”的世界的分野。但曹雪芹与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流是疏隔的，没有接触的证据，和一般的汉人社会接触也有限。因此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主要是满汉文化混合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反封建”、“反儒家”、“对封建崩溃前夕的‘封建社会’的全面批判”之类的说法都失之于宽泛和抽象，离事实太远。